

《文心雕龙》与《文选》

吴 林 伯

南齐刘勰著作的《文心雕龙》(以下称《文心》)和萧梁昭明太子编纂的《文选》,具有互相印证、补充、修正的作用,因此,有的学者称为姊妹书,是完全正确的。

刘勰在《文心》里用自己的观点评议先秦、两汉、魏、晋、南朝的文学,有的放矢,语无虚设,由于他博闻强识,联系的典籍非常多,不少已经残佚,可在《文选》里发现一些,比如他论衡的辞赋,就大都保存在《文选》内,倘若不读《文选》,《文心》的若干观点,便难于具体理解。

昭明太子明显地表达他的文学观点的书辞,只留下《文选序》及其文集的佚本,但其文学观是可以从《文选》本身去探索的。凡属对文学自有主张的作家,往往借选古人的文章,寄寓个人的意见。他们泛览群书,采其合于个人意见的为一集,读者能就选本的体例、篇目,得到选者的观点。

事实告诉我们,昭明太子常与当时名家讨论篇籍,尤其是“爱接”刘勰^①,企图通过著述,品题古、今文坛风尚。不难想象,《文心》《文选》交流了二人的文学观点,不过,反映的方式不同。

过去,《文选》的影响比《文心》大,由曹宪至李善、杜甫,或者详其训诂,或者明其义理,驯致赵宋,乃有景文,小名“选哥”,手抄《文选》三过,流传“《文选》烂,秀才半”的谚语,莫不摘英猎艳,锐精辞章;诸如此类,并非《文选》研究的所有方面。在我看来,还必须考求它所包蕴的文学理论及文学史的因素,本文将从事这样的尝试。

曹丕察觉文学的社会功能,论文盛赞文章为“经国之大业”^②,应璩因而愧其“文章不经国”^③。《文心》开宗明义,声称作品要“经纬区宇,发挥事业,鼓天下之动”^④。所以“丈夫学文”,务必“达於政事”,“摛文”总得关系“军、国”^⑤。则“辞以治宣,不为文作”^⑥,以文“奏劾”,当“不畏强御”,“笔锐干将”,“无纵诡随”^⑦,“文章之用”,一定要侧重文、武的“炳焕”^⑧,不等於蝉噪的花月吟弄。

昭明太子未显白文学的社会功能,但就他对作家的欣赏,知道他和刘勰所见一致。象陶渊明之在晋末,与阮籍之在魏末略同,恰逢易代的时候,都能知机避咎,外表没有什么慷慨的表现,而“咏怀”“述酒”,愤懑寓诸言表,有时不免恬淡只为消去一时烦闷,昭明太子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,“爱嗜其文,不能释手”^⑨,观物造质,乃识渊明身在田园,心存魏阙,“常著文章,颇示己志”^⑩,形隐而心不逸,悼国伤时之情,每每见乎文辞;志士以酒销忧,渊明则诗、酒参会,於是诗竟“篇篇有酒”,而“意不在酒”,诚“亦寄酒为迹”,读者能遣其

“驰竞之情”，“祛”其“鄙吝之意”，所谓田园诗人，不曾超於政治，而浑身静穆，以诗言志，“有助於风教”^⑪。可见昭明太子十分注意文章的思想性。而《文选》载录张衡忧惧谗邪的《四愁诗》，曹植痛恨兄弟相残的《赠白马王彪诗》，应璩讥切时事的《百一诗》，王粲悲伤乱离的《七哀诗》，阮籍常恐罹谤遇祸的《咏怀诗》，左思厌恶士族抑人的《咏史诗》，刘琨哀愤国破家亡的《答卢湛诗》，郭璞滓秽尘网的《游仙诗》，确有其理论根据。可是，与谢灵运齐名的颜延年眼力不如昭明太子远甚，看他品藻人物，东望不见西墙，褒讚渊明，有异昭明太子，盛道弃官从好，幽居超旷的一体，忽其苞桑思危的要害^⑫。

与刘勰同时的沈约，空前明朗地讲到文学的起源：“歌谣所兴，宜自生民始也。”^⑬自从有了人类，便有了口耳相传的歌谣，然而刘勰讲的比沈约更详实。他意识到三皇之世，就兴起歌咏^⑭。《文心》的第一篇《原道》指出：“人文之元，肇自太极。”“太极”是产生天地的物质实体，那末，“太极”时期，既无天地，尚无人类，哪有文学？应知刘勰将“太极”转为太古，亦即原始社会，那时，虽然没有文字，却已开始口头创作，歌谣是主要形式。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生活的需要，表现情感的工具，从语言变为图画，则“《易》象为先，庖羲画其始”。通过人工塑造的图画，就是庖羲首先描绘的八卦，成为《易》以示意的形象。人类再向前进，则“鸟迹代绳，文字始炳”，“人文”的工具，又变为结绳，最后变为文字。

《文选序》发端曰：“式观元始，眇覩玄风，冬穴夏巢之时，茹毛饮血之世，世质民淳，斯文未作，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文，与质相对，《广雅》：“文，饰也。”质，朴素也。书契，文字也。很清楚，昭明太子与刘勰的论述，若合符契，他也认为原始人类，性情淳朴，表情全凭语言，没有采饰，直到伏羲，才画八卦，发展为结绳，以至于文字，出现有采饰的书籍。

庄周、荀卿都言天、人，而天与人反。天者自然，人者造作。《易·贲、彖》分文为“天文”“人文”，刘勰以论文的演化，说“天文”为日、月、山、川的景色，有天地、万物，就有这种文采。故曰“天文”“与天地并生”。“人文”的体势和“天文”的不同，不但有图画、结绳、文字，而且有典章制度……由“天文”到“人文”的次第，确不可拔^⑮、昭明太子在这一点上，无甚叙列，而谈“天文”“人文”的效验，他俩都因循《贲、彖》之辞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人们能从“天文”“人文”观察时节及教化的改变与成就。

作家情感从何而来？刘勰对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就是“同乎旧谈”^⑯。《荀子·天论》：“形具而神生，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臧（同藏）焉，夫是之谓天情。”人一旦有了形体，便产生精神，蕴藏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六种情感，所以叫做“天情”，因为它们都是人“所受於天”^⑰的。换言之，它们都由天赋。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何谓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，七者弗学而能，”显然，这是荀子“天情”的翻版。刘勰同然一词：“人禀七情。”^⑱肯定人有天赋的情感。

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……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政和，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”音乐所表现的情感，随社会的治、乱转移，刘勰也同然一词：“歌谣文理，与世推移。”^⑲历代歌谣的文辞、情感，随社会变化，仿佛风吹动水面，波浪跟着震动似的。

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。”陆机《文赋》：“悲落叶於劲秋，喜柔条於芳春。”外界的景物使人内心摇动，悲、喜的情感产生於春、秋的不同气候、刘勰也同然一词：“情以物兴。”赋家登高观察景物，会兴起情感，诗人“情以物迁”，春天的是“悦豫”，夏天的是“郁陶”，秋天的是“阴沉”，冬天的是“矜肃”，情感随景物的变化而变化。^⑳

昭明太子说了与刘勰相同的语：“覩物兴情。”他也以为作者观察景物，兴起情感，“更向

篇什”^②，从事创作，又和刘勰一样，称自然形象为“物色”，“物色不同，序事或异。”^③《文选》的赋，特立“物色”一类，辑录宋玉的《风赋》，潘岳的《秋兴赋》，谢惠连的《雪赋》，谢希逸的《月赋》，隐喻这些赋家，都以景物所产生的情感作赋，为情造文。

情感的社会来源，昭明太子未明言，而他表示排列选文，“各以时代相次”^④，暗示作品的情感，因“时代”而别，按其先、后的次第，就便于读文论世，披文辄见作家适时之心。

至于天赋的情感，昭明太子意识到，他以为释氏“承禀实能仁”^⑤，是说释氏承受资禀，实际能够布施仁恩，有若孟子所谓人皆有“固有”而非“外铄”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^⑥，正以人有天赋的观念，发动而为情感，作家的高、下，与此相关，晋安王创作“佳”胜，以其“有天才”^⑦，而“词人”之中，本有“才子”^⑧，犹陆机云“才士”^⑨，“才”系孟子“非天之降才尔殊也”^⑩的“才”，无疑指天赋，“词人”所以“名溢於縹囊”，就因为有天赋的情感。

不可否认，昭明太子评论作家，首先提到“天才”，这和刘勰“文章由学，能在天资”，“才为盟主，学为辅佐”^⑪的观念一致。核而论之，人的天赋与情感不无关系，可是决定条件毕竟是教养。西欧的洛克早已批判笛卡尔的“天赋观念”，我国古代的哲学家、文论家，绝大多数未能跳出“天才论”的窠臼。

天地间的一切事物，各个局部都必须摆正，使其整体和谐，足以发挥其效能，文学艺术不例外。《易·艮·六五》的爻辞里有一句名言：“言有序。”“序”者，文从字顺，“若网在纲，有条而不紊”^⑫。语言精妙的特征之一是有自然的秩序，完整而不错乱。

李充认为木玄虚的《海赋》“壮则壮矣，然首尾负揭，亦将未成而然也”^⑬；葛洪称或人认为“五千文虽出老子，然皆泛论较略耳，其中了不肯首尾，全举其事，有可承接者也”^⑭；南齐高帝子晔厌薄谢灵运“放荡，作体不辨有首尾”^⑮；钟嵘怪谢朓属辞，“善自发端，而未篇多阙”^⑯。一言以蔽之，上述作家的共同毛病是作品缺乏系统、完整之美。

刘勰针对这种情况，“言为文之用心”^⑰，撰《附会》专篇，揭露文士“制首以通尾”的“盖寡”，“尺接以寸附”的“甚众”，以致“文章解散”，不能“按部整伍”^⑱；于是强调裁文匠笔，务“总纲领”，“统首尾”^⑲，“原始要终，体必鳞次”^⑳，“首尾相援”，“使众理虽繁，而无倒置之乖；群言虽多，而无棼丝之乱”^㉑。

昭明太子论叙篇章，也以完整之美为准绳，他以为晋安王诗之所以为“佳作”，端在“首尾裁净”^㉒；嘉许《玄圃园讲颂》之所以可为“佳作”，以其“首尾可观”^㉓。

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物有本末。”孔子易“本、末”为“文质”，以论道德、礼仪，从质生文，表里相资，彼此“彬彬”，包咸释曰“相半”^㉔，犹之对称，不得偏胜。汉魏六朝文论家，或以臧否藻辞，刘勰集其大成，扩充“文、质”涵义，约而为三：曰情理与文采，曰华丽与朴素，曰浮华与淳朴^㉕。综观《文心》，殆一以贯之。而《情采》要求世之作者，都领会“文附质”“质待文”，做到“文、质彬彬”，痛恨“近代辞人”“文胜质”的“诡巧”^㉖。

昭明太子的“文、质”观，不翅刘勰，他在《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》里写道：“夫古典则累野，丽亦伤浮；能丽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文、质彬彬，有君子之致、吾尝欲为之，但恨未逮耳！”

这是昭明太子的切至之论，由衷之言，他也感觉齐、梁艺苑的流弊是“文、质”的不协调，或质胜文而失之“野”，或文胜质而流于“浮”，禁之之道无他，求其“文、质彬彬”而已矣，真与刘勰唱一个调子，然此谈何容易？陆机力主“辞达理举”，“无取冗长”，终以知之非难，能之维艰^㉗；其弟云乃以机文病“多”^㉘，刘勰亦以机作“不制繁”^㉙；晋武帝诏“短章清畅”^㉚的张华，“记事采言，亦多浮妄，宜更删截，无以冗长成文”^㉛；萧纲非裴子野学谢灵运，“则不

居其精华，但得其冗长”。②③今检昭明太子之文，不免淫丽之嫌、惟刘勰之作《文心》，奇、偶迭用，自然丽辞，生动有致，成一家风格。

阮籍直指《易》为“往古之变经”②④，讲万物的“变”是《易》的要害，《系辞》所谓“入神致用”的“精义”，正从“变”体现。《文心》的朴素辩证法，恰好是这种“精义”的传笈②⑤。全部《文心》，始终渗透“变”的观念，不把文学当作静止的东西。而且“变”非形而上学的演易。事物随时变化，才能通利有生命力，此之谓“变而通之以尽利”②⑥。刘勰为此谈文学的“通变”或“变通”的目的，是让文学不断上升“日新”②⑦，“日新其采者，必超前轍焉”②⑧。

无庸讳言，昭明太子也继承《易》之“变”的“精义”。《易》的《随卦》集中论断天下事物随时成长，赞赏“随时之义远矣哉”，而“随时变改”的文学，譬如“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凜”，“踵事增华，变本加厉”②⑨，决不滞留原有状态。

当然，刘勰领会《易》的“日新”之“变”，乃就总的倾向着眼，而曲线式的“变”，充分呈现其复杂性，主要不外正、反相生，主次分明。因此，铺陈每个时代的文学，视野不能局限在正或反的一边，主或次的一隅。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枚乘的《兔园赋》，王褒的《洞箫赋》，班固的《两都赋》，张衡的《二京赋》，扬雄的《甘泉赋》，王延寿的《鲁灵光殿赋》等写物大赋，左右两汉，为当时赋的主流，故刘勰“詮赋”，那怕备举，以为“辞赋之英杰”，究非尽善、尽美，而有“侈”之病②⑩。而和此类赋相反的抒情小赋，虽然居于次要地位，要为汉赋的组成部分，亦略而言之。至若《离骚》，刘勰之“辨”复如之，推尊屈原之文而主之，誉之为“奇文”“伟辞”，而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赋，是楚辞之次焉者；三人之中，以玉为最，与原相比，玉又为次，而独崇原创《骚》之功；且玉所赋，见其优、劣，而优实居上，仍“屈、宋”并称②⑪，怪汉代赋家，不能追逐二氏“逸步”②⑫，苟云玉赋之劣，则“淫丽”是已②⑬。

昭明太子同意刘勰的观点，有的默而不言，而用选文隐射。于是汉世写物大赋，选刘勰所“詮”者，同样列于首要地位；抒情小赋，选贾谊的《鵩鸟赋》，张衡的《归田赋》，相如的《长门赋》，给人以附庸的印象。《骚》选屈者独多，玉只选其《九辨》《招魂》；而玉赋之“淫丽”者，仅选《高唐赋》，“丽则”者，选《神女赋》《风赋》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。很清楚，读者可于选文通晓其文论，这是不容忽视，而又必须开拓的领域，以下不妨另举几例。

刘勰以西晋玄言诗兴，江左玄风愈甚，诗、赋无异老、庄的“指归”“义疏”②⑭，遂令“辞意夷忝”②⑮，而“力柔于建安”②⑯，昭明太子则于玄言之制，唯选孙绰《天台山赋》，孙楚《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》，聊备诗、赋史之全、真而已。

刘勰以魏、晋赋“游仙”者，不一而足。有的倾心松、乔，一往不返，神志沉废；有的息影山林，寄志中区，意气“挺拔”②⑰。昭明太子则选“长怀慕仙类”和“词多慷慨，乖远玄宗”②⑱的何敬祖、郭景纯内容背反的《游仙诗》，以见斯体的正、变。

刘勰以一作家，自有短、长，论之标其所长；是以“嵇康师心以遣论”②⑲。叔夜的诗虽亦不凡，而逊于论，论盖师心独见，与旧说对立，不蹈袭前人，而度越庸流。昭明太子则选其否定秦、汉方士长生不死说，赖营、卫延年益寿的《养生论》，以著其思想的通脱，而其《幽愤》《赠秀才入军》诸诗亦入选，不蔽于一曲。

刘勰以刘宋山、水诗盛，刻画“形似”逼真者，固然“巧言切状”，读者“能瞻言见貌”②⑳，可是体势“讹新”㉑者，“崇盛丽辞”㉒，“偏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”㉓，迷恋字句的对仗、藻巧。昭明太子则着重选兼兹利、病的代表诗人谢灵运的篇章，以供学人参验。

刘勰以屈原创《离骚》，宋玉之徒顺流而作。《文心·辨骚》省称《离骚》曰《骚》㉔，而“辨”却包括《楚辞》各篇，增广其内涵。昭明太子则选屈原的《离骚》《九歌》《九章》《卜居》《渔

父》，宋玉的《九辨》《招魂》，以至西汉刘安的《招隐士》，而统名之曰《骚》。

不仅如此，昭明太子也用选文暗示自己的观点，他以汉来的隐有大、小两种形式：象东方朔“陆沉于俗”，避世宫殿中以全身，是“隐朝市”的“大隐”也；陶潜辞禄归耕，优游田园以自适，是“隐陵藪”的“小隐”也^②。故《文选》的“招隐”一类，则选左思尚“小隐”的《招隐诗》，王康琚贵“大隐”的《反招隐》，以彰隐的方式的矛盾。

昭明太子还以魏乐府诗用旧题写新事，饶有生气，而晋来或以旧题写旧事，“屋下架屋，不免俭狭”^③，后者刘勰不取，存而不论；昭明太子也不谓然，《文选》立《杂拟》一类，以明歌诗发展过程中的曲折。

天地有高卑，江河有浅深，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”^④，“情”之为言实也，万物同、异的对立面，是不可掩盖的。“君子”总抵制庄子齐一万物，泯绝同、异的妄见，承认“以同而异”^⑤的真知。所以我们可从《文心》《文选》发掘刘勰、昭明太子文学观点的大同和小异。

昭明太子强调创作，必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^⑥。这两句互文见义，实谓作品的内容，要有“事”“义”而不空洞；形式要有文采而不质木，也就是刘勰说的“文、质相称”^⑦、昭明太子进一步要求作家“综缉辞采，错比文华”^⑧，不轻弃文辞的艺术加工，也得刘勰心之所同然。彦和以“雕龙”名书，比方文辞的修饰，要象工人雕刻龙文那样，指出“古来文章，以雕鐫成体”^⑨，成功的作家，都能“雕画奇辞”^⑩，说明文辞之“奇”异，在于“雕画”或锤炼。

难能可贵的是刘勰以发展的观点和各种文体的特征看待辞采。经典、诸子、史传、诗、赋的体裁、时代不同，不宜用一把尺子去衡量。《文心》肯定“四部”及苏、张策士说词的辞采，就是这个缘故。然而昭明太子以齐、梁诗赋“绮縠纷披”^⑪的美学观点品题历代文体，他口头称经典为“圣人”之作，不能“芟夷”“剪裁”，内心以其文之不美而不入选；老、庄、管、孟之书，文、义并重，各有特色，恰如刘勰所说^⑫，而他以诸子“宗意”，而不重文，文不美而不见搜；“圣人”“忠臣”“谋夫”“辨士”的“辞”“语”，刘勰不摈诸文艺之外，而他以其文不佳丽，托异“篇章”而不相收；记事、系年的史传，刘勰以为文之一类，而他假其不同“篇翰”而遗之；他摘录史传的“讚”“评”，以其有华采；贾谊《新书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列于子部，本他所不搜，《过秦》上、中、下三篇，他以上篇文美，题加“论”字，编于“论”门；他对个人偏袒的美学观点的坚持，亦可见矣。

刘勰懂得文辞的“奇、正虽反，必兼解以俱通”^⑬；原来文辞内部“奇”“正”这对矛盾，互相依赖、制约，而有的“辞人”，公然“逐奇而失正”，造成文辞的“反正”“适俗”，不惜“颠倒文句”^⑭。故曹操《祭桥玄文》，把“心想目存”颠倒为“心存目想”，潘岳《寡妇赋》同，与刘勰同时的江淹，《梁典》称其“爱奇”，作《恨赋》，把“孤臣坠涕，孽子危心”，颠倒为“孤臣危涕，孽子坠心”；著《别赋》，把“心惊骨折”，颠倒为“心折目惊”；刘勰斥之曰“怪体”^⑮。昭明太子录此二赋，若为昭宣时弊，无可非议，而实没斯意，因他自作，尤而效之，曰“心游目想”^⑯，透露消息，其佚文有无尽是累，不可得而寻矣。

孔子讲礼制的“因”与“损益”^⑰，扬雄引而伸之，泛论事物“不因不生，不革不成”^⑱。夫“损益”者，“革”也。从“因”到“革”，是事物繁荣滋长的规律。刘勰以论文学的“通变”，必“参伍因革”^⑲，故“赋自诗出”^⑳，赋“因”《诗经》的“六义”之“赋”，“革”而为独立的文体。则由《诗经》派生之诗先于赋，《离骚》为赋之雏型而先之，“昭昭若日月之明”^㉑。昭明太子对事物辩证之“变”的理解，不如刘勰，他于选文的排列，“各以时代相次”的原则，未彻底实践，而赋先于诗，《骚》后于赋，不亦颠乎！

宋玉含才负俗，曲高和寡，意不自得，假与楚襄王对向以抒愤，刘勰称其“始造《对问》，

以伸其志”^②，自是之后，东方朔向汉武帝上书，陈农、战强国之计，终不见用，假客难其安守贫贱，以为问答，名之《答客难》，汉哀帝时，丁傅、董贤专权，附和之者，皆起家飞声，扬雄独立不惧，寂寂无闻，假人嘲其玄默，即为作解，号之《解嘲》，班固笃志博学，假宾讥其无功劳于世，固辄应之，谓之《答宾戏》，刘勰以三者均《对问》支裔^③。又东方朔以坎坷不遇，历年无成，假吴王问以答之，是为《非有先生论》。王褒为益州刺史王褒作《中和乐职宣布诗》，又为之作传，假与三客之问答以明其意，题为《四子讲德论》。这五篇文章，都以虚构、问答论事，窥测刘勰之意，宜合于“对问”或“设论”，不必分为二类。昭明太子不然，辨体不似彦和的精简，亦可见其端倪。

注释：

- ① 《南史·刘勰传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- ② 《文选·典论论文》，世界书局出版。
- ③ 《文选·百一诗》
- ④ 《文心雕龙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- (以下引用此书，只注篇名)
- ⑤ 《程器》
- ⑥ 《议对》
- ⑦ 《奏启》
- ⑧⑨⑩⑪ 《序志》
- ⑫ 《陶渊明卷·陶渊明集序》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- ⑬ 《陶渊明卷·五柳先生传》
- ⑭ 《陶渊明卷·陶渊明集序》
- ⑮ 《文选·陶征士诔》
- ⑯ 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- ⑰⑱⑲⑳ 《明诗》
- ㉑ 《原道》
- ㉒ 杨倞注
- ㉓⑳㉔ 《时序》
- ㉕⑳ 《物色》
- ㉖ 《全梁文·答晋安王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。
- ㉗ 《全梁文·僧正》
- ㉘⑳㉙㉚㉛ 《文选序》
- ㉜ 《全梁文·东斋听讲》
- ㉝㉞ 《孟子·告子上》(《诸子集成》)
- ㉟ 《全梁文·答晋安王书》
- ㊱ 《文选·文赋》
- ㊲ 《事类》
- ㊳ 《尚书正读·盘庚上》，中华书局1964年版。

- ㊴ 《文选》李善注引李充《翰林论》。
- ㊵ 《抱朴子·释滞》，世界书局出版。
- ㊶ 《南史·齐高帝诸子列传》。
- ㊷ 《诗品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
- ㊸ 《总术》
- ㊹④⑤ 《附会》
- ㊺ 《章句》
- ㊻④⑤ 《答晋安王书》
- ㊼ 《论语正义》商务印书馆出版
- ㊽ 《武汉大学学报·周易与文心雕龙》
- ㊾⑤⑥⑦⑧ 《定势》
- ㊿ 《文赋》
- ① 《全晋文、与兄平原书》，中华书局出版。
- ②③ 《才略》
- ④ 《全晋文》
- ⑤ 《全梁文》
- ⑥ 《全三国文·通易论》
- ⑦ 《周易与文心雕龙》
- ⑧ 《周易·系辞》中华书局出版
- ⑨⑩⑪ 《通变》
- ⑫ 《封禅》
- ⑬⑭ 《宗经》
- ⑮⑯⑰ 《辨骚》
- ⑱⑲⑳ 《论赋》
- ㉑ 《诗品注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- ㉒⑳《才略》
- ㉓ 《丽辞》
- ㉔ 《文选·反招隐》
- ㉕ 世界书局出版《新说新语·文学》
- ㉖ 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
- ㉗ 《周易·睽·象》
- ㉘ 《风骨》
- ㉙ 《全梁文·金梭子》
- ㉚ 《诸子》
- ㉛ 《论语·为政》
- ㉜ 《太玄》中华书局出版。
- ㉝ 《杂文》
- ㉞ 《文选、与吴质书》
- ㉟ 《庄子·天下》世界书局出版。